



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的学术启示

刘运好

摘要:学术研究建立在文献与学术史两种根基上。学术史既是原始文献的再度解读,又包括理论建构的研究前沿。回顾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不仅可以熟稔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理论重构,重新认知历史上曹操“外定武功”的真实人生、“内定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可以在历史研究的曲折过程中发现历史人物的权力与道德的悖论存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与传统的二元张力、文化思潮的立新与破旧的“批评焦虑”以及文学研究的印象与整体的不同认知。通过历史研究重新发现历史,才可能在理论观念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关键词:曹操;人物;历史;文学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3-0110-11

曹操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著名历史人物。从学术史的视角反思曹操研究,也一直是热门话题,代表性成果有孙明君的《45年来文学家曹操研究综述》、章紫璇和吴怀东的《曹操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反思》^①。但是,尚无专题论文系统梳理百年曹操研究史。本文在简要勾勒曹操历史评价的基础上,系统回顾百年来曹操研究史,深刻反思得失,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文化思潮、接受选择几个方面,发掘其中的学术意义,透过历史研究,重新发现历史。

一、作家研究与历史评价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准则。我们很少将文本纯粹地作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即便是无名氏作品,也努力考证作品的产生年代,揭示作者的身份之谜。殚精竭虑地还原作者的历史语境,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与一般文学家不同,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政

治家、军事家,文学创作只是处理军国大事之余的“抒情言志”,他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是曹操研究的其中一个部分。

由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广泛流行,以曹操为题材的京剧剧目层出不穷,曹操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然而,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其思想行为、政治取向、政治手段都极为复杂,由于论者所处时代与所持立场不同,对曹操的评价各异,使曹操生前饱受争议,死后也难盖棺论定。回顾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始终纠缠在人品道德与政治伦理之中。如果将曹操的人生划分为三段,则可见每个阶段争议焦点又不尽相同。

(一) 早期(169—190年)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据考证,曹操十四岁入太学,《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1]2},时人对曹操这一印象应该是在他入太学之后,所以我们姑且以十四岁作为他的人生起点。所谓“机警”“权数”,虽不能说是贬抑,却也

收稿日期:2023-09-01

作者简介:刘运好,男,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芜湖 241000),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学研究。

不能算是褒奖。特别是《曹瞒传》记载他佯装中风,诬骗叔叔,反而在父亲面前诬陷叔叔因“失爱”而冤枉自己的行为,更是背离了一个孩子应有的做人品质。历史没有提供更为详细的记载,但据此推断,曹操年少时品行道德就极具争议。成年后,初入仕途就锋芒毕露,既表现出超凡出众的治政才能,也显露其峻刻严苛的执法原则。才略过人、善于识鉴的桥玄、许劭就看出其乱世英雄的一面。《后汉书·桥玄传》载:“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12]以“月旦评”著称的许劭更明确评价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13]。在走向政治舞台的过程中,曹操出任济南相,整顿吏治,惩罚奸宄,禁断淫祀;拒绝王芬谋废灵帝,反对何进矫诏董卓进京;后来入朝为官,拒绝与董卓合作,谋刺不成,就变易姓名,逃归故乡;最后募集义兵、讨伐董卓。然而,在逃归故乡途中,又发生误杀吕伯奢一家,且留下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15]的自私狂妄之语。这一时期,曹操固然已经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胆识、治世能臣的才能以及谋兴汉室的政治理想,但是道德的瑕疵也十分明显,“雄”中之“奸”也初露端倪。当然《曹瞒传》是三国时吴人所作,出自政敌之手,难辨真伪。误杀吕伯奢及家人之事,诸家记载也并不相同,可信性存疑。

(二) 中期(190—208年)

初平元年(190年),曹操起义兵讨伐董卓之后,先截击乱贼眭固于濮阳,平定匈奴於夫罗于内黄,破黄巾军于青州,甘冒矢石,折冲陷阵,在逐鹿中原的各路诸侯中脱颖而出。建安元年(196年),迎天子,都许昌,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登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此后,战张绣,定袁术,擒吕布,大败袁绍,北征乌桓,最终平定了中国北方,成为一枝独秀的北方统治者。赤壁之战后,吴蜀羽翼逐渐丰满,逐步形成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曹操的这一段历史事实争议不多,其中有几件事多引起后人评论。一是初平三年(192年),破黄巾军;二是建安元年,曹操招集流民,设屯田制;三是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三郡。传统的历史学家,站在维护中央集权的立场上,对这三段历史

事件并无诟病,但是1949年后,历史、政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破黄巾、设屯田、征乌桓,也引得争议蜂起。

(三) 后期(209—220年)

三国鼎立的格局形成后,虽然从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版图上,曹操都占有优势,但是吴蜀辖地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内部稳定,经济繁荣,军事资源相对丰富。尤其是吴蜀政治集团内部也已形成完整的国家政治框架和上下同心的区域性国家认同意识。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方要吞并对方都会遭到其上下同心的抵抗,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国家统一已不可能。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于芍波屯田,就是一个标志。说明此时曹操已经非常清楚,吞并东吴已不可能,故屯田芍波以作长久之计。刘备占领益州后,实力大增,后来曹操在对西蜀用兵过程中,屡遭挫折,形成以汉中为核心的双方拉锯态势。所以,这一时期,曹操虽戎马倥偬,重心却移向操控汉室。早在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以汉献帝名义,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结束了三权分立,自此独断朝纲。所以建安十五年(210年)所下《求贤令》就以“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的身份自居。终于在建安十八年(213年)封魏公,“位在诸侯王上”,且“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钟虡”^[131];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封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蹕”^[135],其仪仗、官制一如天子。曹操后期,不仅实质上已操控朝政,形式上也位同天子,所以才遭到后人“名为汉臣,实为汉贼”的指责。加之曹操又先后罗列罪名,杀戮孔融、杨修等名士,更招致后人的批评。

综观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在有些正统的史书如《三国志》中,曹操是正面形象;从唐太宗《祭魏太祖文》到宋真宗《亳州魏武帝帐庙记》,曹操也还是正面形象。但是,到了宋代萧常和元代郝经的两部《续后汉书》,皆以“正其名义”的传统史学观为标尺,视蜀为汉室正统,其君主升为“本纪”;魏吴为割据政权,其君主皆为“列传”,将曹操写成欺世盗国的僭臣,曹操的形象在史书中被一步步污名化。评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从曹操少年佯装“中风”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再到杀戮孔融、杨修,成为曹操

人品道德上难以洗刷的污点；第二，从“少机警，有权数”到“乱世之奸雄”，再到“名为汉臣，实为汉贼”，又成为曹操政治伦理上难以洗刷的污点。后来，经过小说、戏剧的渲染夸张，白脸奸雄的形象也就成为曹操标配的脸谱。

辛亥革命后，学界普遍脱去了“君本位”观念，弱化了曹操的政治伦理问题，将发掘曹操的历史贡献提到了研究日程。百年来的曹操研究，主要集中在恢复历史原貌、正视曹操政治功绩、客观评价人物形象等方面。但不同时期又有反复与波折。章太炎的《近思》《荀汉昌言·区言一》充分肯定了曹操的历史功绩及政治才能，其《魏武帝颂》对曹操评价颇高：“夫其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加之恭俭，申之以廉靖。……务稼穡故民孳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譎而近正。”^[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更明确说：“曹操代汉……和汉高祖、唐太宗们之得天下实在没有甚么分别。”^[4]后来，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5]此后，又出现了金性尧《谈曹操》、王璞《认识曹操》、王明《曹操论》等系列以肯定曹操为主的文章^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曹操的研究成果有袁良义《曹操论》、王仲荦《曹操》、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和《替曹操翻案》、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谭其骧《论曹操》等文章^③，对曹操的讨论较为广泛，以肯定曹操的历史贡献为主，也看到了其缺点甚至罪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多，且历史误差很大，甚至完全歪曲历史真实。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张金光《论曹操》、柯友根《试析曹操的“重豪强兼并之法”——兼驳梁效的“中小地主进步论”》、沈祖祥《曹操研究的历史反思》等^④，为曹操研究的正本清源做出了相应贡献。此后，学界对曹操的镇压黄巾、屯田制度、北征乌桓、残忍好杀、用人政策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虽也有热烈争论，但已回归于学术争鸣的轨道。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基本维度：是以历史发展为基点，而不是以道德评判为准绳。”正是以此为评价维度而得出结论说：“曹操是‘命世之才，超世

之杰’，也滥杀无辜、清除异己；‘揽申、韩之术’，也崇尚经传儒学；重构‘汉官威仪’，也权欲膨胀，阴怀‘不逊之志’。”^[6]“其文学成就集中于诗歌和文章，其中，浪漫与理性、温情与残酷、坦率与阴鸷，错综交织，更立体地刻画出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多元复合性格。”^[7]

纵观历代对曹操的评价，虽抑扬云泥，褒贬不同，近百年来的曹操研究道路虽然曲折，却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逐渐从脸谱化、符号化的认知方式中回归于历史语境，“庶几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曹操的基本特征。”^[8]

二、文献整理与文学比较研究

文献整理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有关曹操文学研究的文献整理，主要涉及文集整理校释、作品编年考辨、研究资料汇编三个方面。

第一，文集整理。曹操集整理一直都受到学界重视。1911年丁福保刊印《汉魏六朝名家集·魏武帝集》，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重加补充整理；1916年出版《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其中对曹操诗再加校勘整理。1925年黄侃出版《魏武帝诗注》，将训诂与章句结合，前人评述悉加征引，举凡作品疑义处皆加考证。这是第一部关于曹操诗集的经典注本。1949年后，曹操文集整理再次获得突破性进展。1974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曹操集》，不仅辑录曹操全部诗文，而且将曹操《孙子注》也收录集中，且附录江耦《曹操年表》及《曹操著作考》，为曹操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读本，也成为后来曹操集整理的范本。亳县集体编撰《曹操集译注》、夏传才《曹操集注》以及笔者解读的《曹操集》，基本上都以此为参考底本^⑤。笔者对《曹操集》的解读汲取众家之长，不仅有详细的文本编年，而且每篇皆有简略的史实考证以及诗艺文心的解读。书首的“导读”勾稽史料，力图还原曹操的历史原貌，既详尽分析了祢衡、孔融、杨修被杀的深层原因，也细致分析了曹操的思想特点、历史贡献、文学成就等诸多方面。

第二，年谱编撰。20世纪40年代，陆侃如相继发表《建安(曹操)诗谱初稿》《建安文学系

年(196—219)》^⑥。在这期间,陆氏又花费十年时间编撰《中古文学系年》,反复修改,直至去世后,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关于曹操诗谱的内容基本保留在此书之中。1959年,江耦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曹操年表》,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曹操年谱,对《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三国志集解》史料的互相歧异之处加以辨正。1983年,齐鲁书社出版张可礼《三曹年谱》,该书材料丰富,考证精审,是曹操研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此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徐公持《曹植年谱考证》,也涉及大量与曹操相关的史料考证,特别值得关注。

第三,资料汇编。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撰的《三曹研究资料》,辑录了从魏晋到清末有关三曹作品评述及其文学活动的资料,省却研究者的翻检之劳。2003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朱一玄、刘毓忱编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其中“本事编”也可供研究曹操参阅。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华书局整理本《曹操集》、笔者解读的《曹操集》都收录了曹操《孙子注》,而且后者通过对曹操《孙子注》与《孙子兵法》的比较性阐释,将曹操的军事思想、军事谋略及用兵特点充分揭示出来,在曹操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人物年谱的编撰,除了《曹操年表》之外,比较《中古文学系年》和《三曹年谱》,也可以明了相关历史事件和作品系年。特别是笔者解读的《曹操集》,除在目录中已经标明作品系年外,每一篇解读都有作品生成背景考证,即使难以系年的作品也通过文本内容与作者思想及相关史料的辨析,确定其大致编年。

随着对曹操人物认识的不断变化和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思潮、文学史观念的影响,人们开始注意“关系研究”和“比较研究”,即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以及三曹文学特点的比较。这两种研究直接涉及文学史的定位问题。

第一,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特别引起后人注意。刘勰《文心雕龙》、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已经注意到这一文学史现象。刘

勰影响尤大,其《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9]1694}显然,曹操是开风气的人物。黄侃转录《诗品讲疏》释曰:“详建安五言,毗于乐府。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10]所谓“魏响”,就是指不同于汉末文学的建安文学风格。不过究竟谁属于“魏响”的振发者,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锺嵘《诗品下》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11]362}“古直”显然蕴含“汉音”的意味。严羽《沧浪诗话》以“汉魏”含糊言之,胡应麟《诗薮·内编》则批驳之,认为直至子桓兄弟才开魏代文学新的风气。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则下断语:“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12]126-127}民国时期,汪长锐《曹氏父子研究》摘取《古诗源》观点:“孟德所赋诗,皆沉雄俊爽,时露霸气,纯为汉音,绝不类建安文体。子桓的诗,以便娟婉约为主,一变乃父悲壮的气概。”^⑦与陈氏的观点相同。王鹏廷《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以折中的态度,认为曹操诗文介乎“汉音”与“魏响”之间,实际上是黄侃观点的再度阐释^⑧。其实,曹诗虽多是乐府,然主体色调鲜明。从乐府发展史上说,是“汉音”的终结者;从抒情主体性上说,又是“魏响”的引领者。以乐府写时事,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曹操的确是第一人;且如鲁迅所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个性张扬。仅此而言,则应属于“魏响”。

将曹操划归于“魏响”,就说明他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因此研究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成为民国学术的一个热门话题。钱振东较早注意这一问题,其《建安诸子文学的通性》说:“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文学环境,于是散文的辞藻,就变为‘清峻’了。”^[13]此后,关健南《“建安文学”底时代背景》着眼于文化思潮:“曹操以‘一世之雄’,当‘朝野崩离,纪纲文章荡然’之际,因缘时会,取得最高政权。于是治禁理丝,大发挥其政治铁腕,重刑名,用法治,以振颓风,结果法家思想大盛,而儒家之经术思想就衰。法家思想务在深文,文学受其影响,自然也就厚重谨严而为深刻了。……法家思想既经把拘束人心底经术思想打破,于是社会思想便由谨严

而趋于旷达,这种旷达的思想表现在文学上自然通脱驰骋不循故常了。”^[14]当然,他的研究多半集中在曹操文学风格形成的时代和主体原因上,但是他把法家思想作为乱世中的一种文化思潮,不独曹操一人所宗尚,这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李家瑞《曹家文学》则着眼于乱离时世:建安之际,战祸频仍,百姓流离,人命危浅,“是以当时文学之士,咸有人生如寄,为欢几何之感。发为诗文,则为慷慨,为欷歔。情深音怨,气充辞沛”。“此皆时代环境之影响于文学,而使之不得不然者也。”^⑩

今果的《曹操与建安文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数不多的专论曹操文学的文章,细致论述了建安文学的价值:“首先在于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建安文学就它的总倾向和主导方面来说,它比较深刻地批判了汉末腐朽政权和豪强权贵统治的罪恶,相当充分地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疾苦和声音,可以说,建安文学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从艺术的角度,反映了这个充满了变动和灾难的年代。”^{[15]36-37}曹操的诗歌“一针见血地击中当时社会生活的要害”,而且“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以邺都文士集团为骨干的建安文学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曹操培植起来的”^{[15]40-41}。虽然文章难免浸染时代特点,但也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肯定了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也指出:“曹操对建安文学繁荣与发达的贡献主要在政治上为之提供了一个稳定良好并不算太祥和的外部环境。其次是他身体力行带头为建安诗文注塑新气象,开创新传统,建立特定时代的文采风骨使之放射异彩而作出的不朽努力。”^[16]另外,曹操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但是其政治地位,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审美风貌,也影响了建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形成。1929年张道仁的《建安诗的批评》虽然言之不详,却有开创之功。近年来,宋亚莉、郑杰文的《曹操与汉末士人的交往及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以及熊建军、顾兴德的《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弥补了张氏研究的缺失^⑪。

第二,三曹文学特点比较。三曹是建安文

学的中流砥柱。所以锺嵘《诗品序》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11]17}三曹父子血脉相连,文化同根,其文学审美趣尚必然相近。故《文心雕龙·乐府》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9]243}刘勰所言之“三祖”乃指操、丕、睿,因魏明帝立“三祖庙”而连带称之。锺嵘《诗品下》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睿不如丕,亦称三祖。”^{[11]362}刘勰虽批评操、丕作品情感放荡,言辞慷慨,背离了“清商三调”的雅正,犹如郑声之乱《韶》《夏》,实际上恰恰揭示了二人乐府的创新性。而这一点在曹植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

刘勰对建安文学的批评相对偏颇,被后来研究者不断纠偏。民国学者既注意其共同性,如陈登原对曹操乐府评价尤高,认为丕、植乐府受其直接影响,“曹公乐府诸作……真能启迪二儿者矣”^[17];也注意其差异性,如曾毅《中国文学史》说:“孟德如猛将,子桓如美媛,子建如贵宾。”^[18]其实,从折中的态度看,三人同异互见。李家瑞《曹家文学》在论述建安文学的特点及其成因之后,特别点明:“遍观曹氏三代之诗文,咏叹慷慨之作,实逾其半。”其共同处,“文意相生,辞气并逐”,不同处在于曹操“风格苍劲,气色古朴”^⑫。杨剑花对这一问题阐释尤为周详:“魏晋文风之嬗变,曹氏三父子实为其枢纽。子桓为文,便娟宛约,一变其父沉鸷雄桀之作风,而为徘徊俯仰,是能深于情者。子建郁郁不自得,虽为贵胄,而一生坎坷,为文慷慨隽逸,无乃兄柔媚之态,父兄多才,渠尤独步。可知曹氏三父子,各有所长,而文笔亦各自成一体,风格殊不相类,以大体论之:曹操著作少,陈思王最丰富,学问则相若,而天才则以陈思王为冠。”他认为,曹操“奇伟、古劲,具两汉之遗风”,曹丕“娟媚如处子”,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19],各有所长,自成一体。这一评价确实切中肯綮。评价三人长短,成为一时热点,又引起三曹孰优孰劣的争论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

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蔡厚示极力推崇曹操：“综观曹操的全部诗作，虽不能过誉为‘无篇不奇’，但就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两点而言，确不愧为‘建安风骨’之冠，连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略逊一筹，七子之徒更是望尘莫及了。”^[20]后来研究逐渐深入，李洲良细致地比较曹操与曹丕诗风：广而言之，一为阳刚，一为阴柔；狭而言之，一为雄浑苍劲，一为清丽婉约。曹操诗歌意象的特征是大、壮、古、朴，主要采用赋的手法来组合。曹丕诗的意象却是小、弱、柔、丽，主要采用比兴手法来组合^⑤。傅正义又从题材选择、思想内容、总体风格、表现手法、语言色彩、艺术形式六个方面比较了三曹诗歌的异同点^⑥。此外，还有李南冈《试谈三曹诗歌的审美特征》、王昌猷《论三曹诗“气”及其风格差异》、沈念慈《“三曹”乐府的音乐特色》等^⑦，或论其同，或论其异，见仁见智。

由上可见，曹操文集整理校释，1949年以后取得突破性成就。对于曹操思想风格、曹操与建安文学关系以及三曹比较，基本上还是盘桓在民国研究的苑囿之中，而在曹操作品的实证研究和审美研究等方面，却能逐步深入，走向辉煌。

三、诗歌与散文创作研究

任何关于一代文学、文学群体以及作家的整体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曹操虽然一生戎马倥偬，墨突不黔，但手不释卷的勤奋、横槊赋诗的个性及事必躬亲的案牍写作，使之留下大量的应用文体和诗歌创作。其中诗15题24首，令89题94首，教8首，表24首，上书、奏事6首，策2首，书信25首，祭文1首，题识、序3首。除了诗歌之外，所有应用文体都统称为“散文”。在曹操创作中，诗歌和散文既各有特点，又声气互通。后人有整体风格研究，也有分类研究。

风格是作家主体生命的审美性呈现，其中思想个性和审美态度是作家主体生命的主要表征。就思想个性来说，曹操既倡导刑名，也继承儒学。《三国志·武帝纪》说：“揽申、商之法，该韩、白之奇策。”^{[1]39}傅玄上疏说：“近者魏武好法

术，而天下贵刑名。”^[21]这种思想根底和御政方式，加之时世乱离的深刻影响，形成曹操诗文独特的风格。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说：“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文壮节，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22]对曹操文学成就及整体风格的认知，历代评价大致趋于一致。但是，受西方文论的影响，百年来人们的研究视野发生了转变。如钱振东《魏晋文学之时代背景》说：“笃行未必见用，放荡未必见摈，于是士风日趋颓放之途。……至竹林七贤，遂臻颓废之境，浪漫性之文学，乃胚胎于此矣。”^[23]认为曹操用人，“唯才是举”，“放荡”之人亦见重于世，导致士风的变化，促进了建安浪漫文风的形成。在“清峻”“通脱”中，又发现“放”“放荡”，并认为是魏晋浪漫文学的源头——颓废派的浪漫主义，这一说法，立论或可商榷，观点却有启迪。

在曹操创作研究中，诗歌历来最受关注，其横槊赋诗的诗歌风格尤其引人注目。如南宋敖陶孙《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24]清沈德潜《古诗源》评其诗说：“沉雄俊爽，时露霸气。”^[25]从风格上说，“沉雄”“俊爽”的确得其三昧。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又说：“跌宕悲凉，独臻超越。”^{[12]126}在英雄之气中见其“悲凉”，在史诗描述中见其“超越”，确实表现出陈氏独特的艺术眼光。

近代以来关于曹诗整体风格的研究绝少歧见，唯有所论深浅而已。汪长锐《曹氏父子研究》隐括前人“慷慨”“沉雄”，以之概括曹诗风格^⑧。汪辟疆《汉魏诗注·魏武帝》“按语”阐释更为细致：“惟魏武以雄鸷之才，负匡时之略，鞍马论文，横槊赋诗，于激昂慷慨之中，有规模宏远之意，不拘拘于绳尺，不屑屑于时名，而其辞之横绝瑰丽，傲岸自喜，则诗如其人。宜其高视一时，跨越百代，同时作者，咸莫能及。”^[26]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指出：“因为他半世生涯都在戎马仓皇里，耳闻目见，均为伤心的环境和凄怆的材料。所以他的诗歌，遂充满了慷慨悲放之气。”^{[27]31}长期征战，所见满目疮痍，“千里无鸡鸣，念之断人肠”，遂形成慷慨悲凉、通脱放达的风格。在“悲”中又拈“放”字，与“规模宏远”构成呼应之

势。陈美朴、郑振铎等人持论与汪辟疆、郭伯恭基本一致。

1949年后陈飞之《论曹操诗歌的艺术成就》虽也以“风骨”为核心探讨曹诗风格,却又特别点明曹诗“深化了《诗经》以来的忧时悯乱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建安时代社会人生中的种种矛盾能够尽情披露,把现实主义诗歌的批判精神推进了一大步”;“发展了《离骚》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强化了生的意志及其主观能动作用,富有强烈的奋斗不止的鼓舞力量,增强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积极因素”^[28]。这就将民国所论曹操颓废的消极浪漫主义,又拉到向上的积极浪漫主义。后来,也有许多论文研究曹操诗文的风格,如燕世超《略论曹操诗歌的悲壮美》、霍雅娟《悲凉慷慨,沉雄顿挫——论曹操诗歌的悲壮美》、贾长营《气韵雄浑,慷慨悲凉——浅谈曹操的诗歌》、马志英《论曹操诗歌的悲情色彩及审美体认》等^⑩,却都难以跳出民国学者研究的窠臼,曹诗风格研究似乎已经进入瓶颈。事实上,曹操诗文俊爽的一面,至今尚无专论剖析之。曹操诗文浓郁的儒家人文色彩,虽有专题论文如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吴怀东《经学盛衰与曹操诗歌革新》等^⑪,但对由此而形成不同于“沉雄”的“俊爽”风格似乎也没有深入发掘。

单篇作品和分类研究,是曹诗研究非常热烈的部分。林庚《谈曹操〈短歌行〉》认为:“曹操这一首《短歌行》是古诗的代表,它代表着人生的两面,一方面是人生的忧患;一方面是人生的欢乐。……古诗是《楚辞》与《诗经》的产儿。它一方面不失为楚辞上永恒的追求;一方面不失为一个实在生活的表现。这乃是古辞乐府中最可珍贵的一点。它是一个对于人生认识得更透彻后的丰富的生活。”^[29]然而,王福民不同意林庚观点,其《再论曹操的〈短歌行〉》说:“我们把这首歌行详细念一遍,便可知道里面没有一点儿欢乐的成分。”“他是有欲望有野心底‘吃肉动物’;‘东方渐高’能使沉溺者转进更深的悲哀,这‘一世之雄者’,经过了‘龙腾虎跃’的生活之后,由‘慨当以慷,幽思难忘’到了‘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再进一步,竟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上找不到一枝可栖;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呢!”^[30]

之所以不厌其烦引用,因为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关注热点。另外,程会昌《曹孟德〈蒿里行〉“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解》,运用乾嘉考据的方法,诗史互证,在曹诗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新时期以来,李成蹊《曹操〈短歌行〉旧训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袁传璋《曹操〈短歌行〉剩义拾零》,算是遥远的回应^⑫。

曹操诗的分类研究,早期多关注于诗歌体裁。民国时期,或认为四言诗成就斐然,代表曹诗最高成就。章太炎就说曹操四言诗:“上不摹拟《诗经》,独具气魄。”^[31]需火甚至认为:“曹操的四言乐府,尤其后无来者,独步诗坛。”^[32]持这类观点的人数众多,如郑振铎、陈美朴、萧涤非、刘大杰等。但是否定曹操四言诗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郭伯恭从文学进化的观念出发,指出建安是四言衰退的时代,即使是“以操的大才,也终究挽回不过来已经死去了的四言诗的命运”^[27]^[34]。沈达材又从艺术层面上历数曹操四言乐府的失败之处:一是有很多无谓的堆砌,二是叙事太繁琐,三是教训(说理)太多。即使如《短歌行》之类的名篇,也不免有蹈袭风雅词意之讥。他极力称赞其五言诗,认为是有生命的文学,最能代表并体现曹操诗歌创作的新倾向,即民俗化色彩^⑬。

1949年后,学界很少着眼于曹操作品的体裁。在内容决定形式的另一种思维模式下,题材具有积极或消极意义则成为热点。其中,对游仙诗的讨论最为热烈,如陈飞之《曹操的游仙诗》、农作丰《关于曹操游仙诗的评价》、顾农《曹操游仙诗新论》,这些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曹操游仙诗的积极意义^⑭。张士聪则认为,曹诗“走的是一条从现实主义到背离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其后期“诗歌中的社会现实因素愈来愈稀薄,雄心壮志完全被神仙烟霞所包围,为长生久视的欲求所消融,形成了纯粹的游仙诗”^[33]。此外,关于曹诗的用事、用典也成为研究关注焦点。就对《诗经》引用而言,张振龙认为,曹氏家族浓厚的儒家学传统,以及曹操已有自觉的用事意识和依经立义书写原则,是其重视《诗经》的主要动因^⑮。李健则从审美表达上阐释曹操将《诗经》比兴引入的诗学意义^⑯。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越来越趋向于琐碎化。

曹操散文研究相对寥落。刘勰所谓“观其时文”固然包括曹文,但专门论述唯有《文心雕龙·诏策》“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9]749},其他则不多见。其实曹操独具个性的诏令并没有进入刘勰的视野,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受人重视。学者特别注意发掘曹操诗文风格与思想个性之间的联系。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指出:“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3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更为深刻的阐释,简要言之,曹操崇尚刑名,力倡通脱,影响到文章,就形成了“清峻”“通脱”的风格。

1949年后,曹操散文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至新时期才有极大改观。张啸虎从“风遒骨劲”“骨气奇高”“雅好慷慨”“文体清峻”四个层面,论述曹操人格、作风与文章风格的内在关联性。高光复认为曹操散文风格简约严明,抒情真切感人,既有清峻通脱的语言风格,又有严整而不拘于一式的结构体系。张亚新则将曹操散文的艺术特色总结为三点:一是“清峻”,即篇制短小,文意清楚,议论严密尖锐;二是“通脱”,即表意不作假,行文无拘束;三是一些应用文有充沛感情,有人物形象,语言朴直凝练、生动形象^③。笔者概括曹操散文之意义:“从史的角度说,涉及了众多历史大事,是一部真实的汉末风云录;从人的角度说,勾勒了饱满的人物情性,是一部生动的人物写真集;从文的角度说,呈现了多样的文章风格,是一部公文的审美教科书。”曹操散文的风格:“以通脱个性为核心,以气势充沛为内质,以斩截自然为形式,三者之间的交融互生,形成清峻、朗畅、潇散的审美风格。然而通脱而又谨严,鼓荡亦有顿挫,斩截兼有曲折。”“文章风格的多样性与作者主体性格的复杂性,恰恰构成内在的逻辑关联。”^[35]此外,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郑孟彤《建安风流人物》等专著,对曹操散文也有详细论述^④。这一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如张振龙在论述曹操引用《诗经》的基础上,又扩展到曹操散文的语典和事典的运用,特别要指出的是,所引语典在于明理和抒情,事典也有重新诠释和变化;安鹏翔通过考察曹操的仕宦

经历,对前人判定的时间逐一分析,认定《陈损益表》应该作于建安元年九月初七领大将军到罢免三公的这一段时间内^⑤。另有数篇硕士学位论文,或论曹操的笔法特征,或论曹操的令体文,都推进了曹操散文的研究。

回顾百年来曹操创作研究,或论述整体风格,或析为诗文二体;或着眼于体裁,或落实在题材;或以文学理论观照文学,或以乾嘉学风以史证诗,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文学研究并非产生于象牙塔中,难免接受时代风云的洗礼;思维方式也难免受到时代的局限,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

四、曹操研究史的几点启示

回顾历史,是为了重新发现历史。百年曹操学术研究史,既提供了他山之玉,提升当代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昭示了前车之鉴,避免以后学术研究的弯路。学术研究固然是个人的创造,带有鲜明的个性,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典籍、意识形态、文化思潮及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引导意义,但是若不悉心辨析,一味“拿来”,也可能误入歧途。

第一,研究历史典籍,必须注意语境还原。历史叙事有两种情况比较复杂:一是历史的存在,本是一堆碎片化场景的组合,其中有必然性、规律性,也有偶然性、突发性。历史的发展趋势本有多种可能的选项,因为机缘巧合,某一选项成为唯一,而历史学家往往习惯于从唯一的选项出发,逆向寻绎历史存在的因果规律,以此构建“真实”的历史叙事框架,如若后人确信不疑,必然造成历史认知的误区。二是权力的选择与道德的冲突,在古代君王的身上往往是一种悖论式的真实存在,他们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以非道德的方式清洗甚或杀戮政敌,是一种政治常态。有时,因为史学家的政治倾向对部分史实会刻意放大,或因为文学家的主观喜好对部分史实会有意扭曲,后人一旦对这种被放大、歪曲的历史深信不疑,即产生认识误区。如曹操误杀吕伯奢,后人由此而给曹操贴上刻毒、自私的标签,就是如此。对于这类史籍,必须注意在前人提供的有限史料中,按照历

史逻辑,重新剪辑、拼接,力求还原历史语境。对于曹操由忠于汉室到觊觎汉室的历史过程,以及祢衡、孔融、杨修等人被杀的深层原因,如果通过一系列历史细节的语境还原,就不可能掉进史籍叙事的陷阱。

第二,探求历史动因,必须考察意识形态。一方面,中国古代随着王朝更迭,时世变迁,不同朝代统治与治理的方式不同,国家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然而,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传统又逐渐积淀为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自觉地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这又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每一王朝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并非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亡,前一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可能成为新的文化因子积淀于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往往成为群体自觉的士大夫阶层所尊崇的传统意识。简单地说,国家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君主意志;传统意识形态具有稳定的连续性,形成心理惯性。就一个朝代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和传统意识形态有叠合,也有分离。如西晋以曹魏为正统,故陈寿《三国志》对曹操褒赞有加,以彰显历史功绩为主;到了南朝范晔《后汉书》以及宋代萧常、元代郝经的《续后汉书》,自觉的士大夫传统意识形态上升为主体,抽去了曹操在乱世中拯救垂死之汉室的特定历史情境,站在儒家忠君的立场上,痛斥曹操欺世盗国“欺天下后世”^⑧。在阅读这些史籍时,我们务必明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历史张力的对立与消解,悉心探究每一观点出笼的历史动因,必须悉心辨别各个时段的意识形态差异,探究历史真相,避免价值误判。

第三,考察文化思潮,必须谨防矫枉过正。任何学术研究,既是时代文化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深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随着代际学术的新鲜血液的输入,往往能够提供崭新的理论视野,不断改善人的思维结构以及观照事物的视角和方法。然而,在时代新旧交替时,人们满怀激情地拥抱新的时代文化思潮,也最容易不自觉地走进矫枉过正的思维模式之中。比如辛亥革命后,面对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状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救国救民的时代强音;寻找新的文

化理念以打破传统的桎梏,也成为知识分子思想转向的目标,于是西方学术大量涌进。加之那一时期学者多有留学经历,乱世呼唤“超世之杰”与一切向西的学术转向,在造就了民国学术繁荣的同时,也使民国学术留下矫枉过正的暗伤。他们打破了旧道德的桎梏,重塑曹操乱世英雄的形象,但是如果理性地判断不同时期的曹诗研究,大都带有某个时代“批评焦虑”的情绪化印记。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代,先锋者急于“破”旧而“立”新,矫枉难免过正,这也是一种常态,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势必影响对历史的正确评价。

第四,接受前人研究,必须比较同异得失。传统的文学批评大多是印象式批评,印象式批评的叠加才形成整体批评。印象式批评建立在阅读直观的基础上,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如果作者的观点建立在整体阅读的前提下,这种印象式批评往往能够直击审美对象的本质;如果作者存在阅读“盲点”,这种印象式批评所得出的结论就仅是一隅之见而已。比如南宋敖陶孙说曹诗“气韵沉雄”,沈德潜又说“沉雄俊爽,时露霸气”,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切合实际?因为沈德潜《古诗源》是诗歌选本,是在全面阅读曹诗的基础上选其精品,所以他在“沉雄”中又发现了“俊爽”。如果仅就《蒿里行》《短歌行》等作品说,确是沉雄;然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等作品,显然又见俊爽。即使是同一作品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是否在沉雄中亦有俊爽?如果我们沿着“沉雄”一路而忽略了“俊爽”,显然就误入歧途了。曹操诗歌的俊爽与文章的通脱,恰恰昭示了内在个性的一致性,而后一点却被大多数学者所忽略了。所以,一般说来,选本批评比印象式批评往往更具有科学性。只有注意比较同异得失,才能准确地汲取、扬弃。不过,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也是在不断纠正前人“误读”的基础上而生生不息,就这一点上说,我们似乎也不必苛求前人。

阅读典籍,必须善于捕捉历史细节,甄别真伪,还原合乎逻辑的历史语境;阅读史评,必须细致考察不同时代的思想倾向,厘清悖论存在所隐蔽的历史真相。考量前人研究成果,必须注意文化思潮——尤其是代际的文化裂变所产

生的“批评焦虑”，谨防矫枉过正；注意同异比较，回归文本，参酌取舍，同时将印象直观与整体阅读互相贯通。唯此，才可能在理论观念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注释

①孙明君：《45年来文学家曹操研究综述》，《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3期；章紫璇、吴怀东：《曹操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反思》，《黄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②金性尧：《谈曹操》，《万岁》1943年第1卷第5期；王璞：《认识曹操》，《人物杂志》1946年第5—6期；王明：《曹操论》，《中国青年》1947年第7期。③袁良义：《曹操论》，《光明日报》1953年11月1日；王仲萃：《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年3月23日；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光明日报》1959年2月19日；谭其骧：《论曹操》，《文汇报》1959年3月31日。④张金光：《论曹操》，《文史哲》1977年第4期；柯友根：《试析曹操的“重豪强兼并之法”——兼驳梁效的“中小地主进步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3期；沈祖祥：《曹操研究的历史反思》，《江汉论坛》1989年第9期。⑤亳县集体编撰：《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夏传才：《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曹操著、刘运好解读：《曹操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⑥陆侃如：《建安（曹操）诗谱初稿》，《语言文学专刊》1942年第2卷第1期；陆侃如：《建安文学系年（196—219）》，《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1期。⑦⑧汪长锐：《曹氏父子研究》，《惊蛰》1935年第1期。⑧王鹏廷：《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艺术精神探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⑨⑩李家瑞：《曹家文学》，《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7年第90期。⑩张道仁：《建安诗的批评》，《大夏月刊》1929年第2期；宋亚莉、郑杰文：《曹操与汉末士人的交往及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理论学刊》2015年第3期；熊建军、顾兴德：《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⑫李洲良：《三曹诗歌的意象与风格》，《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⑬傅正义：《“三曹”诗歌异同论》，《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⑭李南冈：《试谈三曹诗歌的审美特征》，《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王昌献：《论三曹诗主“气”及其风格差异》，《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沈念慈：《“三曹”乐府的音乐特色》，《艺谭》1984年第2期。

⑯燕世超：《略论曹操诗歌的悲壮美》，《学术界》1993年第10期；霍雅娟：《悲凉慷慨，沉雄顿挫——论曹操诗歌的悲壮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贾长营：《气韵雄浑，慷慨悲凉——浅谈曹操的诗歌》，《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马志英：《论曹操诗歌的悲情色彩及审美体认》，《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⑰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吴怀东：《经学盛衰与曹操诗歌革新》，《江淮论坛》1999年第3期。⑱程会昌：《曹孟德〈蒿里行〉“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解》，《国文月刊》1949年第77期；李成蹊：《曹操〈短歌行〉旧训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徐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袁传璋：《曹操〈短歌行〉剩义拾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⑲沈达材：《建安文学概论》，北平朴社1932年版，第99—104页。⑳陈飞之：《曹操的游仙诗》，《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农作丰：《关于曹操游仙诗的评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顾农：《曹操游仙诗新论》，《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㉑张振龙：《曹操作品引用〈诗经〉原因探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㉒李健：《曹操〈短歌行〉对〈诗经〉比兴的创造性化用》，《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6期。㉓张啸虎：《曹操文章与建安风骨》，《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高光复：《简论曹操的散文》，《求是学刊》1981年第4期；张亚新：《曹操散文的艺术特色》，《求索》1983年第5期。㉔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郑孟彤：《建安风流人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㉕张振龙：《曹操散文中的语典和事典》，《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安鹏翔：《曹操〈陈损益表〉作时考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㉖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萧常：《丛书集成初编·续后汉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0—285页；郝经：《续后汉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45—295页。

参考文献

-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97.
- [3]章太炎.章太炎诗文选注: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57-58.
-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65.
- [5]鲁迅.鲁迅讲魏晋风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1.
- [6]刘运好.回归历史原点:再论曹操[J].中原文化研究,2021(1):76.

- [7]刘运好.真实的人生记录:曹操文学的主体特点(上)[J].文史知识,2021(5):90.
- [8]曹操.曹操集[M].刘运好,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9.
- [9]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6.
- [11]锺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12]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3]钱振东.建安诸子文学的通性[J].师大国学丛刊,1931(1):63.
- [14]关健南.“建安文学”底时代背景[J].南开大学周刊,1932(129-130):5.
- [15]今果.谈曹操与建安文学[J].安徽史学通讯,1959(3):36-44.
- [16]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J].文学评论,1993(5):36-37.
- [17]陈登原.曹操评[J].金陵学报,1933(2):585.
- [18]曾毅.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泰东书局,1931:91.
- [19]杨剑花.魏晋文学拓荒者曹氏父子评传:孟德、子桓、子建之文学及其影响[J].经纶月刊,1942(4):70-73.
- [20]蔡厚示.曹操诗歌艺术剖析[J].文史哲,1983(5):37.
- [2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17.
- [22]董浩,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6649.
- [23]钱振东.魏晋文学之时代背景[J].师大国学丛刊,1931(2):94.
- [24]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8.
- [25]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6:90.
- [26]汪辟疆.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71.
- [27]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8]陈飞之.论曹操诗歌的艺术成就[J].文学评论,1983(5):31.
- [29]林庚.谈曹操《短歌行》[J].国文月刊,1944(27):40.
- [30]王福民.再论曹操的《短歌行》[J].国文月刊,1947(60):20-22.
- [31]章太炎.国学概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93.
- [32]需火.论曹操[J].南风月刊,1948(2):19.
- [33]张士骢.论曹操诗歌的创作道路[J].江淮论坛,1988(6):77.
- [3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
- [35]刘运好.真实的人生记录:曹操文学的主体特点(下)[J].文史知识,2021(6):101-108.

The Enlightenments from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Cao Cao's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Century

Liu Yunhao

Abstract: Academic research is based on found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cademic history. Academic history not only functions a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but also includes the frontier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ake a retrospect of research history of Cao Cao's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it can reconstruct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the re-recognition of Cao Cao's "external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the aesthetic value of his "internalized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shed light on the paradox between the power and morality of figure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imes and traditions of ideology, the "criticism anxiety"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impression and panorama of literary research. Therefore, the rediscovery of history is conducive to conceptual breakthroughs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which might give birth to the novel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Cao Cao; characters; history; history of literary research

[责任编辑/随 斋]